

北京口述历史丛书

# 风雨征程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013031320

北京口述历史丛书

I251  
556

# 风雨征程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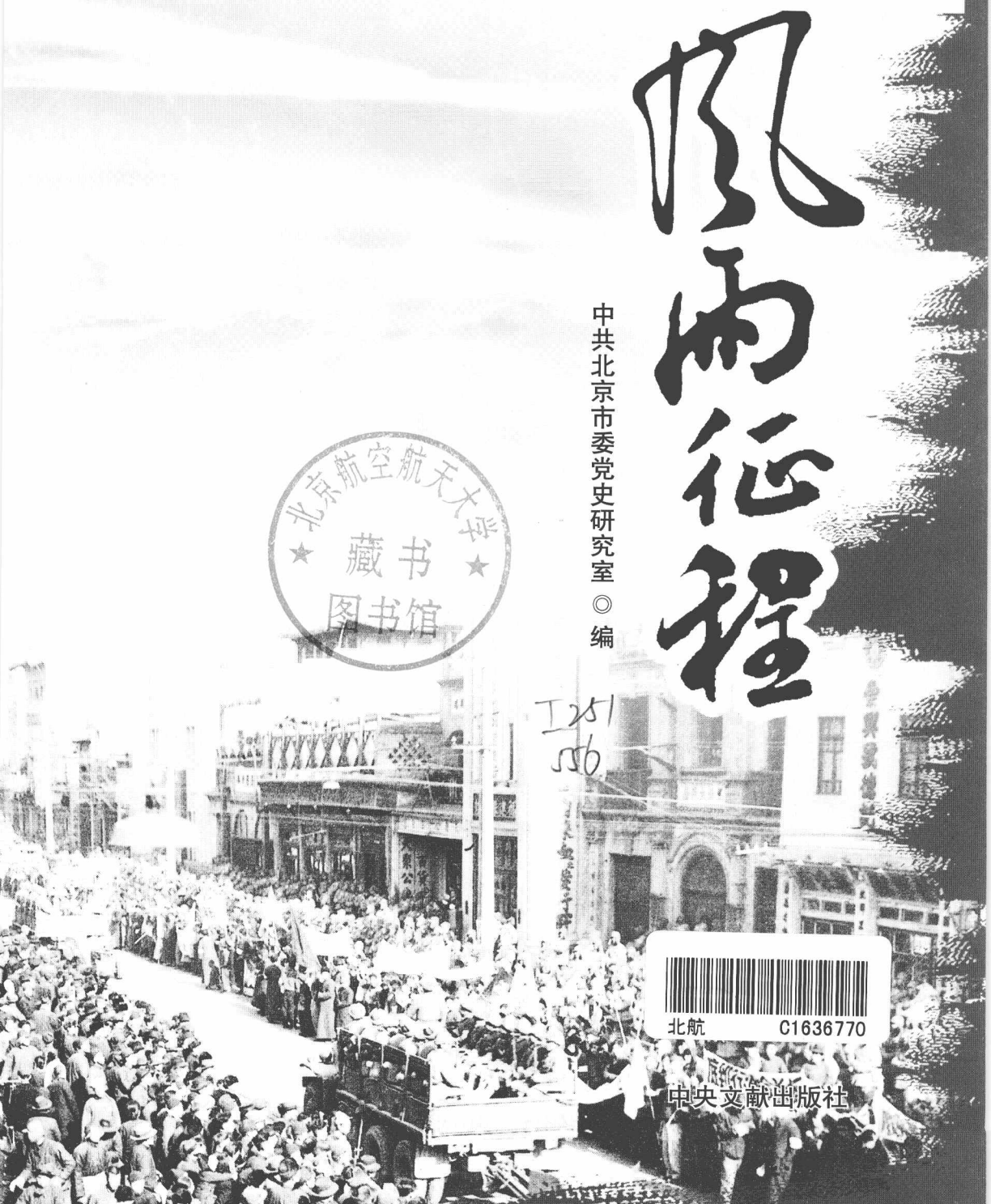
I251  
556



北航

C1636770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雨征程 /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073-3193-6  
(北京口述历史丛书)

I. ①风… II. ①中… III. ①革命回忆录-作品集-中国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53797号

北京口述历史丛书: 风雨征程

编者 /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 / 孙 翊

封面设计 / 周逸斐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1号

邮 编 / 100017

经 销 / 新华书店

排 版 / 北京嘉美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新魏印刷厂

680 × 1000mm 16开 21印张 230千字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73-3193-6 定价: 48.00元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 《北京口述历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谢荫明  
副 主 任 陈志楣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李明圣 陆 兵 范登生  
周 进 温卫东 韩勤英

## 本书编辑部

主 任 韩勤英  
副 主 任 宋传信  
编辑人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锦辉 宋传信 张文良  
张惠舰 杨华锋 韩勤英  
瞿宛林

人们常说：岁月消磨不了记忆。这句话作为一种感慨，作为文学艺术的语言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岁月是可以消磨、尘封甚至淹没记忆的。

原因何在？不言自明。记录在纸张上的档案、资料，保护不当，会有分散和遗失。即使是刻在石版上的经文，可以躲过水淹火焚，却躲不过冰霜雨雪和风化的剥蚀。保存在人们脑中的记忆，更是随着人体机能的退化，记得的越来越少，忘却的越来越多；记得准确的越来越少，误记错记的越来越多。这是自然的辩证法，是无可更改的规律。

人类的进步，建立在一辈辈的繁衍、一代代的知识积累之上。因此，经验的归纳、教训的总结、智慧的传承是必不可少的。人们把凝聚在物质上的历史称之为“人类物质文化遗产”；把记载在纸张上（现在又有了很多新的电子保存手段）的历史成为“历史文献或档案”；更重要的，还有一部分历史，他们存在于健在的当事人头脑之中，通过他们的口，这些历史仿佛可以活生生地再现，我们把这种历史称之为：口述历史。

在历史学的发展上，口述历史曾经占有极其广阔、长久的地位。结绳记事，口述歌颂，曾经是许许多多民族曙光初现时的第一章。在现在和当代的历史中，口述历史仍然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

一下子扯远了，从研究北京历史的角度来看：

口述史是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补充，有时甚至是历史链条中唯一

的环节。如中共作为革命党的时候，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为夺取政权所从事的活动，很多地方、很多时间是在“非法”的、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强大敌人的压迫下，党内文件和记录被查获，会立刻引来杀身之祸。所以，那时人员的组织关系往往是单线联系，那时的行动计划和方案往往都是口耳相传，没有文字记载。即使有，很多的珍贵文字材料也都毁弃于战火之中。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党创建的过程，地下斗争的许多事迹，都来自当事人经年之后的追忆。

口述史有鲜活的特色。比较计划、总结、纲领、宣言而言，口述史可能没有那么的周全，那么的字斟句酌。但因为口述者都是亲历者，在表述过程时描绘的场景，流露出来的个人情感，会使我们有身临其境之感，拉近我们和过去历史的距离。解放战争时期，青年学生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豪情，在如今已届耄耋之年的老者口中道来，依然使我们经受着那份炽热的爱国热忱。

口述史揭示着内幕。历史的发生都是在具体的地点、时间范围内，该时该刻，亲身经历的人是有限的，要澄清历史真相，亟待当事人的回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的地下党情报工作、定都北京的经过、粉碎“四人帮”的细节、改革开放决策的制定……随便撷取几例便可知晓，没有亲历者的回忆，没有口述的记载，恐怕后人读史时，会失去了几分色彩。

口述史的记叙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它至少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口述者，一是记录者。口述者难在要有健康的头脑和身体，要有资料的准备，要有客观的分析，要有不改事情原委的勇气。实在的说，回忆也是一桩痛苦的事，谁不是记取失败和教训比成功和欢乐更深刻呢？记录者难在采访前的准备，难在提问纲目的梳理，难在被动的等待，难在事后的整理，难在知识面的不足等等。尽管如此，几十年来，北京口述历史的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出版了民主革命时期有关的许多回忆专辑，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口述材料也在不断地整理和披露出来。这得益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益于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解放，也得益于录音录像等设备的使用和普及。

口述史的编写是一项很紧迫的任务。20世纪80年代，曾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把征集口述历史叫做“抢救活资料”。多亏了那时的工作，把不少涉及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大革命时期、建党时期，甚至五四时期的亲见、亲历、亲闻记录下来、抢救下来。当我们刚松一口气，却又发现新中国成立时的小伙子、改革开放时期的部门领导，如今竟也七八十岁了。岁月如梭，时不我待，抢救还须继续。

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目的是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把那些曾经参与过相关历史活动的老同志、当事人、知情者的回忆口述集中起来，作为历史档案的印证、补充和参考。用确凿的事实、生动的语言、具体的感受去复述过去的那段历史，从建党到现在；去重拾那些故事，从农工商、科教文卫的发展到名人百姓中的奇闻轶事；去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不论是平淡还是激昂，不论是失败还是成功。

口述史的组织、采访、撰写、编辑、出版尚处于摸索的阶段，我们愿意踏踏实实地去做铺路者的工作，因为历史的瑰宝不能遗失，因为读者和听众在期望，因为我们历史工作者的责任和良心。

当时光又过去了几十年、上百年，当我们都已不在的时候，我们的声音还在，我们的容貌还在，我们的记录还在，更重要的是，我们讲述的历史真实还在，那是多么令人愉悦的事情啊！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吧！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 目录 Contents

### 回 编者的话

### 回 峥嵘岁月话人生

- 2/ 一生抉择终不悔 ◎孙孚凌  
20/ 九十载甘苦志不移 ◎高戈  
46/ 从卢沟桥抗战一路走来 ◎王玉槐  
72/ 征途漫漫行思录 ◎李晨  
90/ 我的“晋京赶考”之路 ◎李莉

### 回 风雨征程忆京华

- 122/ 多方努力，促成北平和平解放 ◎王汉斌  
131/ 忆北平解放前后二三事 ◎刘先人  
142/ 解放初期北京的宗教工作 ◎姜立勋  
150/ 我在北京亲历的一些历史事件与思考 ◎张道一  
178/ “文革”琐忆 ◎宋汝蓉

### 回 艰苦创业铸辉煌

- 208/ 与新中国法制建设同行 ◎顾昂然  
228/ 我所亲历的首钢巨变 ◎高伯聪  
250/ 我与垦荒不了情 ◎杨华  
275/ 回忆人民大会堂建设 ◎沈勃  
297/ 我与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不解之缘 ◎储传亨  
308/ 参与北京大型活动设计的回忆 ◎朱祖朴

### 回 后记



峥嵘岁月

话人生



# 一生抉择终不悔

◎孙孚凌



【孙孚凌简历】孙孚凌，男，汉族，1921年9月生，浙江绍兴人。1938年至1945年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光华大学和华西大学。

1948年至1958年任北京福兴面粉厂经理、厂长。1958年至1983年任北京市服务事业管理局局长、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委，民建北京市副主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1983年至1993年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常务副主席，北京市第六届、第七届政协副主席。1993年2月至1998年1月任北京市第八届政协副主席。1993年8月当选为第九届北京市工商联主委，10月被推选为全国工商联第七届执委会名誉副主席。1997年6月当选为北京市工商联第十届名誉会长。1997年11月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合会第八届名誉副主席。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45年我从（成都）华西大学经济系毕业以后，先后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淮南煤矿当职员。1948年冬，应父命接手福兴面粉厂，几乎与此同时正式介入政治生活。此后的60多年，我一直工作与生活在北京，经历了国家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

### ◎ “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

我从小在家庭中就受到开明正直的祖父、母亲以及伯父孙越崎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前后，我正在东北读书，亲身感受到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氛围，还出于对日本人的仇恨与日本同学打过架，因此挨了日本老师的打。后来祖父举家迁到北京。我13岁，即离家赴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结交了一些进步同学，参加过爱国学生运动，因此形成了爱国、抗日的进步思想，奠定了日后“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基础。

1935年12月，著名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那时我才14岁，就在郑怀之等进步同学的带领下参加了运动。曾在天津南开中学范孙楼的后面，油印学生运动的传单；跟随郑怀之、王刚等到天津西车站拦截火车去南京请愿要求抗日。1936年夏天，我和郑怀之到天津附近的杨柳青，和大哥哥们一起做宣传抗日等活动。但当时我并未参加进步学生组织，也没有人邀请我参加。

抗日战争胜利后，有两件亲身经历的挨打事件，对我选择道路起了重要的影响：一次是在福兴面粉厂，我被小特务敲诈殴打，现场的工人群情激昂，我怕进一步造成恶果，拦住了工人们，阻止了事态的扩大。另一次动手的是美国官兵。我与内弟在天津，到朋友家去。路上遇见两个美国兵调戏中国姑娘，我当时愤愤不平，予以制止，挨了美国兵的打。令人气愤的是，在场的中国人，包括我的内弟，都在一旁观看，不敢站出来相助。当时美国军营的墙上写着“美国×军占领”，他们是以占领者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的，一味横行。因此，1947年我父亲让我到美国留学，我拒绝了。

1948年底，正在淮南煤矿营运处工作的我接到家里的紧急电话：

速回北平准备南迁。南迁就是南逃。当时东北已经解放，淮海战役炮火正酣，北平已成铁壁合围之势，解放军兵临城下，国民党要员纷纷携家眷南逃。我的父亲——北平福兴面粉厂厂长，由于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也已将部分生产设备运到沿海城市，做好了南逃的准备。1948年12月8日正好是冬至日，寒风凛冽，我回到了北平。此时北平解放在即。

当时有句话：“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我曾说过，国民党要能好的了，死人会从棺材里爬起来走路。所以我是无路可走才回来的。在学校时，我思想靠近进步青年，与郑怀之、王刚、邢方群、邓裕民等交往密切。他们有正义感，人品好，而国民党特务总是盯着他们不放，我猜想他们一定是共产党。这样的人治理国家，中国一定有希望。正好，我父亲要南逃，要我回来。从我的思想上看，虽然还有“共产主义不一定适合中国”的想法，但已经有了进步的思想基础。我是回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是：一手反对国民党，一手反对共产主义。我以为非常精辟。就1940年代末的情况来看，工商业者中少数有条件的跑了，而多数在那种不得已的形势之下，也欢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回来后，我找到郑怀之，这才和中共北平市委有了联系。我的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 ◎ 解放初期的政治活动

我回到北平以后，和地下党有了接触，并立即参与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政治活动中。不久国共和谈，国民党方面和谈代表邵力子到北京，我即去探望。邵力子先生既是我伯父孙越崎（时任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老师，也是我本人的证婚人。从邵力子随员张月超的谈话中，我得知：国民党不想和平，停战的可能性不大。我便将此信息转告了郑怀之，郑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后来据郑怀之说，此信息当

夜便转到了周恩来副主席那里。

解放初期，我与中共北平（京）市委领导彭真、刘仁本人有过一些接触，对他们总的印象就是实事求是。我实际上是在刘仁同志的直接领导之下，但见刘仁的次数不多，他传达政策都是通过统战部和其他部门的。彭真是市委第一书记后来兼市长，在很多会议上都有接触。他对北京有个要求，说北京是首都，不是尾都，要求北京事事都带头。

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百废待兴，新政权如何建立，旧城市如何管理，是一大课题。1949年3月开始，进城不久的军管会一连召开数次北平市各界人民代表协商座谈会，已经接掌了福兴面粉厂的我参加了工商界代表座谈会议，会议地点在台基厂老的德国大使馆内。参加会议的有：彭真、叶剑英、聂荣臻、刘仁、吴晗、李乐光、李续刚；民主人士雷洁琼、钱端生；工商界人士浦洁修、刘一峰、陈荫堂、王向宸等等，共四五十人。座谈会议题广泛，有如何组织、恢复生产，也有如何安排城市居民生活的各种问题。

会上大家发言踊跃，群策群力。

陈荫堂说：解放了，太高兴了，赔钱也干。我心想，你有多少钱赔呀？赔钱总有赔完的一天。发言时便实话实说：解放好，少赚点也可以，赔钱不现实。赔光了企业，你的工人怎么办？这个发言说得彭真连连点头。王向宸的话更妙了，当时正解决房屋问题，他说凡是好房子都搬出来，让老百姓去住。意思就是“共产”了。总之，会议就是讨论如何管理城市、治理北京方方面面的问题。这些会议经常开到夜里一两点钟。4月21日凌晨一点多钟时，就是在座谈会上，彭真同志向大家宣布：人民解放军渡过了长江！这个消息使得与会代表情绪大振。实际上，各界代表座谈会就是政协的前身。

经过紧张的筹备，1949年8月9日，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来自25个界别的33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我作为工商界代表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协议委员会委员。当年11月，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正式更名为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由协议委员会更名

的协商委员会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常设机构，我当选为副秘书长，参加了会务工作。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先后参加过两次会议。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毛主席讲，北京这个地方是唱戏的地方，各朝各代的人物都要在这里唱，但是封建的统治者唱得不好，人民群众不爱听，现在我们来唱了。毛主席号召，全市人民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及其潜伏的特务分子外，一致团结起来，为克服困难，建设人民的首都而奋斗。

当时我参加的重要政治活动还有一项，就是旁听1949年9月全国政协会议。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政协分正式代表、列席代表，旁听不在政协委员人数里面，但也在怀仁堂。那里条件舒适：大厅搭建会场，旁边是正厅、东西两房，两旁有沙发，可以一边看文件、抽烟，一边听报告，声音很清楚。从1949年9月旁听第一届政协会议开始，到2003年3月卸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我见证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与发展的54年历史。

说起新中国成立之际的岁月，我深有感触：中国人民百余年来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我也亲身遭受过日本和美帝国主义的欺辱，所以爱国心是很强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人民才推翻了“三座大山”，获得了解放。特别是1949年9月旁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时，听毛主席高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非常振奋，并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我至今清楚地记得1949年10月1日那天，我在天安门城楼下参加开国大典观礼时，听到城楼上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声音和周总理的朗朗笑声。从此，我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毫无私利、充满生机与活力、始终保持革命性和先进性的党，是一个勇于开拓、不断创新、锐意进取的党，是一个不畏艰险、久经锤炼的党。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像中国共产党那样把中国人民带向富强、幸福和光明的未来。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担任了北京市政治协商会议的副秘书长，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副秘书长，还有中苏友好协会的副秘书长。北京

市委统战部部长崔月犁很放手。在他的领导下，我参加的政治活动范围更广了。记得有一次与日本代表团会谈，那个日本代表团团长叫三浦八郎，可能是属于日本共产党系统的。此外在抗美援朝战争当中，我曾两次参加赴朝志愿军慰问团。一次是1950年年底，当时抗美援朝开始不久，一批志愿军伤病员撤到东北各大医院，我作为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副秘书长参加慰问。时任团长李德全（冯玉祥夫人）、副团长吴晗（时任全国青联的副主席）、魏传统（时任军委总政秘书长）。这是一次没有公开的慰问。另一次是参加第三次赴朝慰问团，团长贺龙，同行的有梅兰芳、马连良，还有吴晗等人。吴晗有点秃头，记得他在台上讲话，当讲到“我代表全国青联……”时，台下青年“嗡”地一声哄笑起来。1953年，我还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赴罗马尼亚参加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及世界青年联欢节。会议期间，传来朝鲜战场停战的消息，举会欢呼，中国代表团的代表们将胡耀邦团长抛上接下达半小时之久。

当时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我目睹并亲身参加了一些如火如荼的斗争，先是对中国共产党有好感，后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伴随了我的一生。

### ◎ “福兴”与“五反”运动

福兴面粉厂创建于1937年，由我父亲孙英坡独资经营。初创时仅有3部制粉机、2部石磨（磨玉米粉），到1948年，扩展到8部制粉机，职工87人。由于当时北平的工业十分落后，福兴已算是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面粉厂了，我父亲也成为当时很有实力、颇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之一。

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围困北平，我父亲决定南避香港。速召我回来接管福兴。后来父亲滞留上海，香港之行未成。北平解放后，经我等劝说，我父亲实际了解到党对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遂回到北京，任福兴董事长，不兼实职。我接手福兴面粉厂后，担任经理，始终只领取工资，产权依然为父亲所有。

回到北平后，我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先后参加了地下党外围组织“职业青年联盟”以及“中国民主建国会”，亲身参与了国家的一系列政治活动；企业管理上深受西方教育的影响，用我自己的话讲：“我是专门夺我父亲权（管理权）的。我和他说，你要是让我管的话，你就什么都不要管。”一系列的有效措施，使福兴面粉厂在解放初期迅速恢复了运转。

全国解放后，我很注意学习党的政策和企业管理知识。在管理上委托资方代表人张芷江（后因1958年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而跳楼自杀）负责；在机械工艺方面委托技师郑春田负责。三年经济恢复时期，我扩建厂房，安装解放前已购置的设备，经过政府加工订货和贷款扶植，生产迅速地得以恢复和发展。我常对职工说：“大家好好干！我和老经理（指父亲孙英坡）不一样，老经理赚了钱装腰包；我赚了钱肉肥汤也肥。”福兴面粉厂几年资方均未分红，而是把大部分盈利用于增加职工工资福利和扩大再生产。为此，1953年北京市有关部门专门研究了“关于私营福兴面粉厂工资过高，资本家利润过低的解决方案”。

作为福兴面粉厂经理，我在缴纳税款、稳定物价、发展生产、认购公债方面在工商界中起了积极的带头作用。例如，1950年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福兴面粉厂捐款16200元，我个人捐款2000元。随着我在北京市工商界声誉的提高，影响扩大，先后担任了北京市工商联常委、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常委，北京市各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副秘书长，北京市青联副秘书长等职。

带头发展生产的事我记得很清楚。我父亲要跑到南面去，想在南方设一个面粉厂，他把机器运到天津。解放后，我把机器又运了回来，并用赢利投了一些资，由原来的8部机器增加到14部，扩大了生产规模，发展了生产。这是事实，我印象很深。此外，我还改变了经营方式，将过去的自产自销等级粉改成全部为国家来料加工。14台机器每天生产一万袋标准粉，一个福兴面粉厂就可以保证全市十分之一市民的口粮供应。加工比自销利润要低，但可以扩大



生产，有力地保证城市供应。我就是我的少赚不赔。

对于工人，我则是有别于父辈的另一种管理理念。我父亲满脑子都想赚钱。如果不想赚钱，也就不成其为资本家了。可我不同，我那时学生气十足，管理上是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工人不错。我看到厂里卫生条件不好，医疗条件不好，便修了厕所，修了浴池；厂里还给职工劳保看病——医疗费人均一块钱多一点，有两个原因：一是那时东西便宜，二是职工也很少生病；厂工会还组织职工去旅游，由厂里出钱——我那时年轻，也爱出去玩。因此，职工和我的关系不错，直接反映到“文化大革命”时要批斗我，老职工下午找到我家里，说要保我。当然，实际上斗我的时候，他们想保也保不住，谁保我谁就陷到里面去了——保护资本家是什么立场？但老职工的这番心意我是理解的。

1952年“五反”运动中，我一面坚持做好工商联的工作，一面帮助父亲孙英坡交代问题，最后被评为“完全守法户”。但其中也有一定的曲折。“五反”时我解脱出来很晚。我对这很奇怪：别人都定性了，为什么我老是定不了性？组织上让我“再重新考虑”，我就给自己胡加（罪名），往哪里加呢？加工订货方面我可以加上去。不过加到最后，连派来核查的有关同志都不相信了。石金奎（工商联副主委，中共党员）到我家来，要我拿着账本，看漏掉什么没有，结果发现一点也没有漏掉。直到“文化大革命”我参加劳动改造的时候，职工们聊天，我就在一边听，才了解这件事的原委。有一次听到厂里负责小麦、面粉收发的工人说，他的徒弟小姜“五反”时被整得睡不着觉，因为上面要他查仓库里的粮食丢没丢。这个时候我才弄清楚，“五反”迟迟不能过关，原来和仓库里的粮食有关。其实仓库工人姓甚名谁，以及仓库大门怎么开，我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偷仓库粮食呢？当然最后我还是解脱了，亦被评为守法户。

“五反”运动结束了，但我对“五反”的思考并没有停止。我始终认为：解放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是为以后工商业改造做铺垫的。解放不久虽然进行了平抑物价、打“粮老虎”等运